

東選集



蘇中出版社出版

1

毛澤東選集

第一卷

蘇中出版社

一九四五年七月

毛澤東思想

(序代錄集)

朱德	周恩來	李富春
劉少奇	彭德懷	陸定一
岡野進	陳毅	陳伯達
曼努意斯基	鄧發	艾思奇
徐特立	博古	范文闡
康生	王稼祥	蕭榮臻

「……中國共產黨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黨，它吸收了世界各國工人運動底綜合歸納起來的寶貴經驗，它繼承了中國幾千年歷史積累下來的優良遺產，它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三大階段中鍛鍊了自己，豐富了自己，在這劇烈無比的鍛鍊中，它把馬列主義中國化了，把歷史遺產進化為適合於現實社會的需要了，這種光輝的成就，體現在我們黨有了偉大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及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體現在我們黨中有幾十萬優秀的幹部，他們在黨中央領導下各竭其力，各盡其責地做成無數福國利民的事業。這些黨員都是千人為傑萬人為俊，極可寶貴的人才，每一個黨員應該自尊自愛，力求精進，去完成中國革命的歷史任務。……」（朱德：「七一廿二週年感言」）



「……我們的黨在這二十二年中，在三次連續不斷的全國性的革命戰爭中，是經過了各方面的嚴格考驗的，它經過了多次的勝利，也經過了多次的挫敗，它是走着非常迂迴曲折的道路，以至於今日——但它還能够屹立於偉大中華民國的國土上，並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成為中國政治生活與歷史變遷中重要的決定因素之一。唯其因為它是走過路程迂迴曲折的道路，經過了各方面的嚴格考驗，所以它也就把自己鍛鍊為特別堅強，它也就具有各方面的特別豐富的革命鬥爭的經驗，可以說它在這二十二年中比世界上任何一國的共產黨都經歷了更多的重大事變，有更豐富的革命鬥爭的經驗，不論是武裝的與羣衆的，國內戰爭的與國際戰爭的，公開的與祕密的，經濟的與政治的，黨外的與黨內的……各種複雜形式的革命鬥爭，我們的黨都經過了，都有豐富的經驗，而特別值得提出的，就是在二十二年長期艱苦複雜的革命鬥爭中，終於使我們的黨，使我們的無產階級與我國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我們的毛澤東同志是二十二年來，在各艱苦複雜的革命鬥爭中經過考驗的完全精通馬列主義戰略戰術的，對中國工人階級與中國人民解放團結抱無限忠心的堅強偉大的革命家。

廿二年來我們黨的鬥爭經驗是極豐富的，是各方面的現在我不能一一加以說明，但是在各種經驗

中，最重要的一個經驗是什麼呢？我認為在各種經驗中最重要的一個經驗就是關於什麼是真正的馬克斯主義者——什麼是真正的布爾塞維克，這個問題。大家知道只有馬克斯主義才能救中國，在中國也有許多人以馬克斯主義者自命，然而何者是真正的馬克斯主義與真正的馬克斯主義者，何者又是假的馬克斯主義與假的馬克斯主義者？這個問題是在中國革命羣衆中，並在中國共產黨內多年沒有完全解決的一個問題。馬克斯主義與馬克斯主義者是有真假之分的，這種真假之分並不以各人的主觀自命為標準，而是有其客觀標準的，如果我們的黨員不了解這種區別真假馬克斯主義者的客觀標準，而不自覺的盲從在一些假馬克斯主義者之後去進行革命，那是再危險也沒有了的事。這種經驗應該是我們黨的各種痛苦的一個經驗，過去我們黨遭遇了許多不應有的挫折和失敗，走了許多不必走的彎路，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我們的黨內存在這些假馬克斯主義者，許多黨員不自覺的盲從在這些假馬克斯主義者之後，以至使這些人佔據了某些組織某種運動的指導地位，甚至在某種時候佔據了全黨的指導地位，因而把革命運動引上痛苦的困難的道路，這是我們全體黨員必須引為深戒的一個痛苦經驗。

中國共產黨員艱苦奮鬥英勇犧牲的精神，以及宣傳組織工作的能力，並不弱於任何一國的共產黨，我們對於各種工作素來就是工作得很好的，可以幾千萬幾百萬的組織羣衆，可以二萬五千軍長征，也可以在敵後那種艱苦與沒有任何援助的條件下組織根據地，堅持抗戰六七年……，中國共產黨員的革命精神與艱苦工作精神是很可欽佩的。然而我們在過去很長的時期內關於科學的馬列主義的思想上的準備是很不夠的。在過去歷史上我們最吃虧的地方就是在革命運動的指導上還不免發生錯誤，因而就使運動遭到部份的有時甚至是嚴重的不應有的損失，這一個歷史的教訓，我們必須記取，並且必須在今後完全解決這個問題。可以說，只要我們能够保證，對於中國革命運動的指導在各方面不發生嚴重原則的錯誤，那就等於保證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因為我們有很好的革命精神與艱苦工作精神，中國革命的客觀條件一般又是很好的，只要加上正確的馬列主義的指導，那革命就一定要逐步的走向勝利。

然而要怎樣才能保證我們黨在各方面對革命運動的指導不發生嚴重原則的錯誤呢？這就須要我們的黨員首先是我們的幹部能够辨別馬列主義者的真假，就須要在革命的隊伍中在黨內粉碎各種假馬列

主義的體系及其派別。就須要很好的進行學習，提高我們的嗅覺，就須要把毛澤東同志的指導貫澈到一切工作的環節和部門中去。

從有馬克思主義以來，在馬克思主義運動中就有真假兩派馬克思主義者，整個馬克思主義運動的歷史，就是充滿着這兩派馬克思主義者鬥爭的歷史。那末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運動中，也同樣的有兩派馬克思主義者，也同樣的充滿着這兩派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鬥爭，這是我們一切黨員必須澈底認識明白的。

一派人是假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孟什維主義與機會主義者，他們照例只在表面上承認馬克思主義，口頭上宣揚馬克思主義，而不認識馬克思的實質，不會實行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變成公式教條。他們在工作的時候不拿經驗與對實際工作的計算來做根據，而拿舊本來做根據；他們在決定指示和方針的時候，不是從分析具體實際生活中去求得，而是從書本上，從歷史上相像的事情，或相同的事情裏面去求得；他們言行不符，口講馬克思主義而實際上作的就完全非馬克思主義，客觀事實的發展常常是欺騙他們的，他們總是灰心失望死氣沉沉。

另一派人就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列寧主義者，布爾什維主義者，他們是實行馬克思主義的，將馬克思主義化為實際，他們特別注意規定適合環境的實行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手段以及這些方法和手段的變更，他們在決定指示和方針的時候，不是在歷史上相同的事情和相像的事情裏面去求得，而是由調查研究周圍的情況中去求得，在工作時他們不拿書本上引證和成語來做根據，而拿實踐的經驗來做根據，並拿經驗來做檢查自己每一步工作，在自己的錯誤中學習和教訓別人，來推動工作前進，這派人言行一致，口講馬克思主義，做的也是馬克思主義，他們不僅說明世界，而最着重的是改造世界，他們經常保證馬克思主義的活潑的，革命的力量。

這兩種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共產黨內部來也是存在的，前一種假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就是陳獨秀，彭述之和中國的托洛次基主義，就是李立三路線，就是內戰時期的「左」

機會主義，就是教條主義，這些東西實質上就是中國的孟什維主義。後一種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就是毛澤東同志，以及圍繞在毛澤東同志周圍的其他許多同志，他們歷來所堅持，所奮鬥的路線，他們的工作方法實質上就是中國的布爾什維主義。……」（劉少奇：「肅清黨內孟寧維主义思想」）

毛澤東思想論

「……共產國際第二個支部，在自己國家和自己人民生活中起着巨大作用的支部，就是中國共產黨。它現在有××萬×千個黨員，它不僅和工人們，而且和廣大農民羣衆聯繫着，它在知識界中，特別是在學生中，也有巨大的影響。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武裝部份。這個黨是在多年的國內戰爭和民族解放戰爭火燄中受過鍛鍊的；它在過去積聚了蘇維埃運動和蘇維埃政權建設的經驗；它有豐富的組織廣大游擊運動的經驗，而這種經驗對於中國現今的民族戰爭是非常寶貴的。

它擁有實行瓦解敵人力量的高度技能，善於深入敵人後方，和在敵軍內部進行廣大政治工作。中國共產黨現今開展得最快的，是在游擊運動所包括的區域裏，在日軍後方。

它在鞏固和發展民族統一戰線——這是保證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強盜的基本條件——的事業上，作出意志堅強和行動機敏的模範。中國共產黨的強，就是它那造就和提拔新幹部的工作。中國共產黨底優秀人物——毛澤東和朱德，是政治領導者和天才將領品質俱優的人物。……」（錢掌）（曼努意斯基：「在聯共十八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我來延安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和中國人民緊密的握手，為反對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日本法西斯軍部而戰。」

關於這一方面，中國黨已經積有不少的經驗了。利用這個機會，我要向偉大的中國黨及其領袖毛澤東同志學習，並且把我的知識和經驗貢獻給中共和八路軍。

提到毛澤東同志，我抵延以後，幾乎每天都和他暢談，這是一種非常幸運的事情。

我認識毛澤東同志已經是很久的事了，第一次是從日本軍部，第二次是從「西行漫記」中的介紹，第三次是從許多中國同志的傳說。日本軍部雖然和毛澤東同志是誓不兩立的敵人，但他們却也不得不稱他為千百萬人中難找到的傑出的組織家。在我這次真正會見了毛澤東同志後，果然是質如其人，而在這次的接觸後，則更覺得日本軍部上列所言，不過只是毛澤東同志的一小部份罷了。毛澤東同志在英德宣戰時發表的談話，這是真正掌握了馬列主義的文件，因此我覺得他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人物。到了延安以後，更為事實所證明了。而從我們若干日來的談話中，如果說我從他身上獲得最深刻的印象，即是覺得他是傑出的理論家，組織家和天才的戰略家。他的經歷二萬五千里長征，掌握統一戰線政策，整運動遍及各種著作可作例證。還要加上重要的一條，那就是他對東方各民族革命運動中所洋溢着的高度熱忱……」（閱野進：「對新華社記者談話」）

★
「朱毛在國際在蘇區外最大多數的人都以他們兩人一定是英雄，是怪物，是天上的，但是蘇區的羣衆却認為他是老實人。而且聯繫到說中央政府，中央局負責的，都是老實人。我會聽得江西羣衆唱的農歌有一句，『好人朱德毛澤東』。又有一次，我參加瑞金的羣衆大會，有人在會場上喊：『朱總司令毛主席是老實人，中央政府都是老實人』。羣衆的認識，是十分正確的。

★
「現在我來作一個結論，毛主席的工作作風確是列寧的作風。列寧的作風是俄國的革命精神和美國的實踐精神相結合的作風。」（徐特立：「毛主席的實際精神」）

★
「……中國民族解放整個過程中——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正確道路，就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澤東同志在其著作中與實踐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塞維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

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共產黨的民族解放的正確道路，是在與國外國內敵人的鬥爭中，同時又與共產黨內部錯誤思想的鬥爭中生長，發展與成熟起來的。

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以後，便積極的參加了中國民族解放鬥爭，二十二年如一日，其中參加了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蘇維埃運動與最近六年來的抗日戰爭，中國共產黨便在這些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中壯大起來，毛澤東思想也是在三大革命鬥爭中生長起來成熟起來的。

中國共產主義——毛澤東思想不僅在和中國民族解放的敵人的鬥爭中生長起來，並且是在和共產黨內部錯誤思想的鬥爭中成熟起來的。

在中國共產黨二十二年的歷史中，曾經有過左右傾機會主義。在大革命時有過陳獨秀投降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又有過張國焘反對國共合作的左傾機會主義；在大革命失敗後的蘇維埃運動時期中，有過盲動主義李立三路線，及蘇維埃後期的左傾機會主義；在抗戰時期中，又有過新的投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右傾機會主義。這些左右傾機會主義，都是沒有找着中國民族解放的正確道路，或者是受了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做了資產階級的尾巴；或者是小資產階級衝動，以願望當政策，跳過革命的必經階段，以為中國解放的三大課題可以同時解決；或者是資產階級的現實主義；或者是資產階級的「浪漫主義」。中國共產黨是在克服與反對這些機會主義的鬥爭中壯大起來。中國共產主義——毛澤東思想也在這個鬥爭中生長起來。

毛澤東同志從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後，便在中央工作，參加製訂了第一次大革命中共的政治路線，反對了張國焘的反對國共合作，同時又反對了陳獨秀主義，在湖南下鄉調查農民土地問題，在中國在中共是第一個把農民土地問題提到中國革命中應有的位置。大革命失敗後，即首創蘇維埃運動與紅軍，確定了蘇維埃的各項政策與紅軍的戰略戰術及紅軍軍政工作辦法，又抗擊了李立三路線及蘇維埃後期左傾機會主義。在抗戰時期中，毛澤東同志又提供了抗戰的正確道路，批判了黨內黨外對抗戰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錯誤思想，反對了黨內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抗戰路線的投降主義，寫作了

出名的小冊子「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共產黨人發刊詞」等等著作：在最近又發動了整風運動，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與黨八股，以教育共產黨人更好的掌握馬列主義，更好的解決中國革命問題。

以毛澤東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主義，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基礎，研究了中國的現實，積蓄了中國廿二年的實際經驗，經過了黨內黨外曲折鬥爭中而形成起來的。它既不像那些簡單抄襲舊本搬進理論，把理論當教條而自命為馬列主義，把主觀主義當作馬列主義；也不像那些以中國人民民族意識來投機，抄襲一些中國封建時代的古書，同時偷運一些外國最反動的法西斯思想，而自命其理論為中國「本國貨」，把封建思想與法西斯主義當作中國民族解放的理論。它是創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它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布爾塞維主義。（王稼祥：中共與中華民族解放的道路）



「……當中共創立之日起，黨還處在馬克思主義小組時代，即有人主張將黨保持為純粹的學術團體，不作實際工作，當時黨克服了這一偏向，堅決走到工農羣衆中去進行有系統的工作，毛澤東同志那時即在湖南開始工農運動，即是一例，這是我黨創立之日起，即採取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正確路線。

當民國十二年到十六年，國民革命聯合戰線時期，最初關於是否同國民黨聯合問題，陳獨秀採取右的路線放棄了自己立場，而張國燦則採取「左」的路線，反對國共合作，只有毛澤東同志同其他同志等主張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盟，應加入國民黨去積極推進國民革命運動。其次，民國十六年黨的五次大會前後，黨內關於農民運動與土地革命的爭論，當時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及帝國主義勾引對革命動搖的一些人，掉頭壓迫工農，而工農階級因未得到革命實際利益，開始對革命不滿，特別是農村的農民所受壓迫未有絲毫改善，要求革命深入實行土地革命，以鞏固革命勢力，毛澤東同志根據當時在湖南五縣農村調查，主張實行解決土地問題，以擴大和鞏固聯合戰線以挽救大革命的危機，陳獨秀不能

接受，反而斥責工農運動「過火」對工農運動採取消極態度。第三，在大革命最緊急時期，毛澤東同志主張黨建立自己的武裝，發動游擊戰爭以開展新的革命形勢，陳獨秀則主張放棄實際革命工作，到書齋去研究他的取消主義路線，毛澤東同志的主張首先在湘粵贛閩諸地實現了，遂開始了以後以江西為中心土地革命時代，土地革命偉大（民國十六年到民國廿五年整整十年）的成就是不但保護了中國革命的傳統，而且使黨在極反動的時期中佔領了革命陣地，創造與鍛鍊了強大紅軍，創造了革命的新戰略戰術，有了政權工作、羣衆工作和建設根據地的經驗及以後完成二萬五千里長征和在南方堅持了二年游擊戰爭，特別是五次圍剿失利後，形勢非常緊急，都賴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同志正確領導得以平安渡過這難關。

到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時期，黨即完全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對抗戰對民族解放事業作了空前偉大的成就和貢獻，順利的完成了由土地革命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轉變，只有張國焘一個人落伍變成大地主資產階級的一個特務，抗戰以來我黨堅持對敵抗戰反對妥協投降，尤其敵後抗戰最為艱苦，均能渡過重重難關，同時我黨堅持民族統一戰線，堅持與國民黨合作，反對分裂，排除萬難，始終保持了合作局面。毛澤東同志在黨內提出整風建黨的方針，都是極有遠見的英明指示，——所以我們已有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領導正確的中央，是百倍的提高了我們戰鬥的勇氣和勝利的信心！——陳毅：「在七一紀念晚會的報告」

「……因此廿一年來的中國共產黨，是久經考驗過的布爾塞維克的黨，他的黨員和幹部，他的領導人樞，黨的中央和他的領袖毛澤東同志，都是久經鍛鍊能征慣戰基本上已經走上完全的布爾塞維克化的道路，對一切鬥爭環境均能適應，一切鬥爭方向均能掌握。最初中國共產黨要依循西歐的理論，自己在理論上是沒有任何建樹的，廿一年的實踐中，完整的發現了中國革命的規律，這個中國革命規律證明了馬列主義原則的正確性，證明了中國問題只有依靠馬列主義原則才能正確解決。這個中國革命規律是馬列主義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所發見所提煉的，可是他又豐富了補充了發展了馬列主義原則。馬克思時代是資本主義和平發展的時代，馬克思的偉大的創造力，在於發現了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

，指出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勝利的必然性。列寧的時代是帝國主義與革命戰爭時代，列寧的偉大在於具體的解決了無產階級為革命前革命後建立專政和鞏固專政這一偉大的革命議題。史太林的任務是繼承列寧的任務，如何去解決一國社會主義的建設問題，鞏固這一建設問題，以及發展這一建設的問題。但是從馬克思、恩克思、列寧到史太林關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問題均已站在無產階級革命的範圍上作了原則的考察，而且有了基本的原則的指示，這些指示正是中國共產黨行動的根據，也是其能取得勝利的原因。可是無論馬列史他們除基本的原則指示而外，他們並沒有更具體實際的替我們解決中國革命全部原則問題與全部實際問題。這還用馬列主義來全部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與實際問題的任務，不能不落在中國共產黨身上。二十一年來的實踐由於全黨的努力，特別毛澤東同志的天才走得更遠，這一問題是開始獲得正確的解決。

舉例來說，比如：關於中國的社會性質，革命動力，前途，以及相應而引起的革命戰略策略諸問題，特別對待中國資產階級的態度問題，對待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代理人的問題，中國革命民族民主的兩重性問題，歷來在國內外以及中國黨內外均是爭辯不休的問題。只有毛澤東同志指出中國資產階級的兩重性和他的兩面政策，中國社會兩頭小中間大的特點確定了中間勢力的地位，以及中國無產階級應採取針鋒相對的革命的兩面政策，這就開始揭穿了歷史之謊，澈底的解決了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中華民族有幾千年的長期鬥爭歷史，所以人與人鬥爭的這一類知識比世界任何國家都要豐富。但在人與自然鬥爭這一類知識屬於生產和自然科學這方面的知識，近三百年中國遠遠落後於歐美，人們每每看見後者的現象，遂連帶否認前者，是不正確的，事實上關於革命鬥爭的戰略策略問題，以中國為最複雜，最豐富，沒有馬列主義的唯物辯證法是絕不能理解的。我黨在二十一年內兩次與資產階級合作的經驗在毛澤東同志的天才發掘之下正確建立了聯合與鬥爭的理論系統。這正是馬列主義的戰略策略學說上的新發展。

又如：在組織和領導革命戰爭的問題上，特別其中的戰略戰術方針上，這是一個歷來大的爭論問題。不僅發生於黨內而且於黨外。就是在蘇聯的軍事家中也有不相同的見解。十多年来依違於蘇聯

經驗，北伐經驗，歐戰經驗之間，彷徨歧路，無所適從。只有毛澤東同志根據十多年的實戰經驗獲得了解正確的解決。提出了以弱敵強以被動對主動以分散對集中以農村對城市的正確的戰略方針。提出了內線持久的防禦戰與外線速決的進攻戰的戰略戰役方針。提出了游擊戰陣地戰運動戰聯合運用的戰役戰術方針。提出了統一戰略意志之下的獨立自主的游擊戰方針。進攻時反對冒險主義，防禦時反對保守主義，轉移時反對逃跑主義，游擊時反對游擊主義。這些正確的新原則正是得力於十年來的戰爭實踐，解決了爭論問題。依靠他在戰爭中打了勝仗，反對他的又在戰爭中吃了敗仗。這不是平常軍事家或者一本兵學書上可能解決的問題。

又如：關於蘇維埃政權的理論和建設問題，列寧史大林根據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中工人蘇維埃的經驗，靈活運用，創造並確定了完整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政權的形式和內容，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遂獲得新的完整的發展。毛澤東同志根據蘇聯蘇維埃的理論和經驗，根據中國黨秋收暴動廣州暴動的經驗，能够很熟練地使蘇維埃成為半殖民地的工農民主專政的武器，這又是蘇維埃政權理論上實際上的新發展。

又如：關於建黨的問題，馬克思時代已創立了黨的學說，但工會與黨的界限並不清楚，黨與工會是混同的。列寧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黨的學說，創造了完整的無產階級革命的黨的學說。史大林則最善於進行黨內兩條戰線鬥爭去保護黨的原則黨的組織及其戰鬥力，更把馬列主義建黨的學說發展到更豐富完整的地步。但馬列史建黨學說均根據西歐各國的條件，堅決反對把資產階級式的民主主義傳染到黨內，反對把第二國際黨內的極端民主化的小資產階級的浪漫的奢氣滋生在黨內，故特別強調黨的紀律，強調民主集中制。我黨根據馬列主義關於黨的學說來建立中國的無產階級的政黨，二十一年的經驗教訓，在反對黨內左右傾機會主義及其組織領導上的家長主義營銷主義個人英雄主義調和主義自由主義宗派主義等鬥爭中，獲得偉大的進步和創造。比如從遵義會議到六中全會，這幾年來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主張鍛鍊黨性，鍛鍊黨員的立場和思想方法，發揚黨內民主，保持黨內原則的高度的統一；特別最近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倡導的整頓三風運動，發動了全黨的思想上教育上的革命，

講到全黨同志的思想的深處和最裏層，這更是偉大的創舉，影響我黨本身及中華民族將不能計量。這種建設黨的新理論和辦法，無疑義是根據着馬列主義建黨的原則，可是又不是照抄書本，而是充分根據着中國民族的特點，根據着中國黨內的實際狀況，具體靈活的運用了馬列主義武器，發展了馬列主義武器。劉少奇同志許多關於黨的論文恰可作全黨在這方面極優秀的代表。換句說，馬列主義建黨的原則如今落在中國共產黨手上變成活生生有肉有血的東西，變成了全黨的日常生活必需品，變成了黨提高黨的戰鬥力的有力的武器。這是我黨歷史上所沒有的創舉，就是在世界各國弟兄黨中也不常見這樣新穎而正確的先例。

又如：關於正確思想方法問題，對待西歐新學術問題，對待中華民族的傳統問題，中國學術思想的改革問題，中國革命建國的理論實踐問題，這些問題是幾十年的新舊爭論不決的問題。據我所知五十年前有張之洞、葉德輝、辜鴻銘、嚴復、康有為、梁啟超等的中西學之爭。往後有孫中山康有為民主革命與君憲改良之爭。往後五四時代又有蔡元培、陳獨秀、魯迅、林琴南、王國維、丁文江、張君勛等新舊文化與科學文學的爭論。再後有普羅文學中國社會史等論戰。這些爭論表面是新舊之爭，其實是思想方法上的唯心論與唯物論之爭，是中國革命實踐的爭論，其政治上階級屬性，是包括封建階級，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三大階級的政治經濟利益的確切反映。這樣複雜錯綜的思想鬥爭先後表現了幾種傾向：第一種是完全保守封建傳統的閉關主義主張排斥歐化，拒絕任何些微的改革，這就是封建主義的代表。第三種傾向是全盤承認歐化出主入奴的資產階級的傾向。或者換句說是民族資產階級的資辦性在思想學術界的反映。第三種是新舊調和維持現狀的小資產階級的傾向，依違兩可於新舊爭論之間。第四種是質事求是追求真理正確吸收外國的經驗，正確運用民族傳統，正確聯繫理論實踐的觀點，來具體靈活地解決中國革命的實踐問題，這就正確解決了幾十年的學術思想的爭論問題。在五四時代毛澤東同志在湖南主辦湘江評論時即一面反對當時最时髦的洋八股和守舊的頑固派而主

張實事求是澈底革命。而後在大革命以前即提出馬列主義的中國化問題，與黨內舶來品教條主義對抗。大革命失敗後，毛澤東同志領導秋收暴動轉輾游擊於湘贛粵閩四省之間，進行蘇維埃的紅軍建設，進行實地的中國社會的調查，主張以科學頭腦科學方法，對待馬列主義中國化問題，主張世界革命思一較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有了更具體完整的創獲，正確的思類體系開始創立。最後，是在抗戰之後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乃是一百年中國學術思想上及社會實踐問題上，其中新舊爭論的最正確的解決。這是一本馬列主義的新創獲的著作，也是一本馬列主義的古典的著作，這是中國共產黨以及中華民族理論戰線上的光榮代表。一百年來的中華民族是最受苦難的民族，在長期鬥爭被人家擊敗爬不起來的民族，精神上思想上作了舶來品的俘虜，失掉了民族的自尊心，和民族的自信心，中國資產階級的新學派，正代表著這個傾向；另一面便是頑固守舊夜郎自大的誇大狂阿Q主義的主張；這兩種主張無例外影響到中國共產黨內部。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經驗主義，都或多或少是上面兩種傾向在黨內的傳染。黨在遵義會議以來的一切設施和教育一直到最近整頓三風便完整的正確解決思想方法問題，他不僅於全黨有意義，且於全民族有偉大的意義。……這些一切已足夠說明我黨二十一年來全黨和毛澤東同志在艱難困苦中，在失敗挫折中，在與自己的錯誤鬥爭中，在與强大敵人鬥爭中，其創造其成就的偉大。

我們只就某種程度，某種意義上講中國黨二十一年來的經驗教訓不僅於中國有意義，也於國際方面有其重大的意義。其教訓中某些方面，甚至可供其他各國的取法。比如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對於統一戰線策略，對於革命戰爭策略，對於建黨的經驗，取法於中國黨是完全可能的。……（陳毅：「偉大的二十一年」）

「……我們黨二十一年中，在遵義會議以前，十三年半中，黨的領導路線大部份時間是正確的，但是陳獨秀主義半年，立三路線的半年，蘇維埃初期的三年，則是錯誤的。在蘇聯主義期內，雖然總路線是對的，但是部份策略上犯了盲動的錯誤。在遵義會議以後，整整七年半的期間中，我們黨的總

路線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始終是正確的。在這期間，我黨完成了二萬五千里的長征，結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敵後堅持了五年抗戰，在全國抵擋了兩次反共高潮，在黨內則肅清了張國焘主義，糾正了在抗日統一戰線中的右的與「左」的錯誤。如果反過來想想，假使我們的總領導是主觀主義的，那末情形會怎樣呢？假如我們對於日寇的戰略不是主張毛澤東同志所說的持久戰，而主張的速決戰；假如我們對於大資產階級反共派，或者只有鬥爭無聯合，或者只有聯合無鬥爭，或許抗戰的情景就已經不堪設想。不但如此，在毛澤東同志的四部著作中，在中央的許多決定指示中，可以看見我們黨的中央確是掌握了辯證唯物論的思想方法，已經有本領善於把馬列主義應用到實際中去了，我們黨日益深層的發現中國社會的內在實情，及其發展規律，不是忘掉中國的特點，而是更確切的掌握了這些特點，并依據中國的特點，發展了馬列主義，因而在工作中就取得了成績。遵義會議以來，七年半的成績，不但替我們準備了現在舉行廣大深入的思想鬥爭的思想武器，也替我們準備了研究的物質基礎。有了這七年半的歷史，我們就不僅在事實上看見什麼叫做主觀主義，而且也在事實上看見什麼是辯證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這個哲學名詞，這個抽象的概念，這個難以捉摸的東西，現在已經被解釋成活生生的事實，被充實以血和肉，變成了通俗的，中國化的，人人可以了解的東西了。馬列主義被發展了，被推進了。……（陳定一：「為什麼整風是黨的思想革命」）

「……新民主主義是根據新的國際環境與中國的特殊環境所必須經過的階段，中國革命一定要分做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第二步是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是毛澤東同志天才的創作……」

不經過新民主主義而想達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何以說中國革命必須經過新民主主義呢？第一是因為中國共產黨認清楚中國的實際環境，就是說認清楚了中國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國民黨有些人常說共產黨不懂得中國國情，我看只有國民黨中某些人才真正不懂得中國國情，從來沒有看見中國國民黨對中國社會性質有一個明確的說明，只說中國是一個次殖民地，阿彌陀佛！一次殖民地究竟是一個什麼東西呢？人們的腦子弄得糊塗了……



中國的資產階級在革命的過程中表現動搖、軟弱、反動，造成這種特性的原因，是因為它不能完全脫離封建勢力，也不能脫離帝國主義勢力。這種勢力都在拉它，所以很不易向前進一步，因此它不能完成中國民主革命的。於是歷史任務就加重了中國無產階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責任……

中國革命之所以必須經過新民主主義階段，第二是因國際上社會主義在猛烈發展，資本主義在急剧崩潰，這兩個世界，劇然變化，對於中國革命有著十分重大的影響，對於這一點應有足够的估計，因為這一點決定了中國革命不是走向資本主義而是走向社會主義，中國有強大的共產黨，有在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軍隊，有布爾維塞克的中央的領導，能够保證無產階級羣衆人民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獲得勝利。中國資產階級想使中國革命走向舊的民主主義道路——即趕上歐美等國資產階級專政的舊民主道路，那是主不通的。中國民族民主革命進行一百年了，從鴉片戰爭起，中國資產階級就想走這條路，却始終沒有走通，這是因為世界各國資本主義已經發展起來了，中國的資本主義沒有發展的餘地了。今天，全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時期已經過去了，資本主義已經走到了它的沒落死亡的時期了，中國資產階級想走英美的後塵，固然是幻想，即是走資本主義的道路也沒有可走。另一方面中國進步的小資產階級，尤其是破產的革命知識份子，看到了蘇聯社會主義的發展，認識了社會主義的好處，其中一部份不免發生急性病，想把兩步並作一步走，一蹴到社會主義，這也是不可能的。只有老老實實的執行幾個階級的聯合專政，完成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即是說只有經過新民主主義的階段，才可能走向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是長期的，必須經過這個長期過程。

新民主主義雖然是一個長期的艱苦鬥爭的過程，但這條道路是中國人所要走的道路，是走得通的道路。……

【三三】制政權是在這個歷史過程中的鬥爭的武器，它反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一黨專政，爭取了中間勢力，加強了民族團結，毛澤東同志在抗戰幾年中，對於理論上的偉大貢獻，有持久戰的理論和新民主主義的理論，「新民主主義論」就是輝煌的傑作。記得遠在一九一八年時期，斯太林同志即提到「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革命，從十月革命後即與社會主義構成了一條新的反帝革命戰線，一